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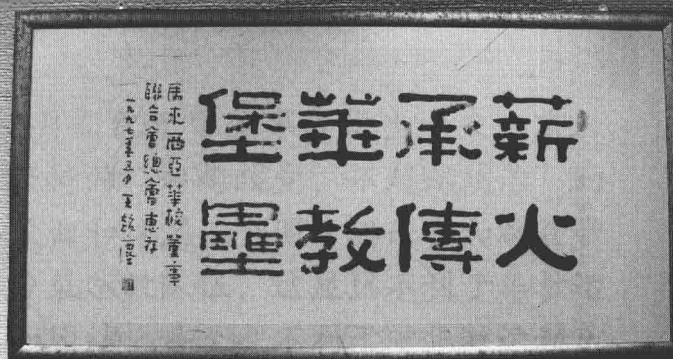
董教总任重道远



明确使命、站稳岗位

明光 著

董教总任重道远



明确使命、站稳岗位

明光 著

出版：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

Persekutuan Persatuan-Persatuan Lembaga Pengurus Sekolah China Malaysia.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 Dong Zong ）

地址：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 Selangor, Malaysia.

电话：Tel: 603-8736 2337

传真：Fax: 603-8736 2779

网址：Email: ucscam@djz.edu.my

印刷：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 45169-k ）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03-62589211

印数：0,001-5,000

版次：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出版说明

自2008年6月新纪元学院事件发生以来，有人对董总长期所坚持的“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原则方针蓄意歪曲和抹黑，企图给舆论界和群众带来混淆，进而分裂华教队伍，这显然不利于华教运动的健康发展和团结，甚至也不利于对华教运动历史的客观评议和总结。董总在过去诸多场合对此方针和原则曾经反复声明加以作出澄清、阐述。

这里出版了资深的社会工作者明光先生的《董教总站稳岗位，任重道远》。他从客观和解决当代民族问题的角度阐发了对董教总斗争的肯定，从近年来华教运动的得与失的角度，突出地总结了董教总坚持“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理念与方针的肯定性和积极性，批判了各种对董教总所坚持的路线与方针的误解和歪曲。

鉴于目前各种奇谈怪论仍然充斥华文媒体，特别是一些表面“激进”而实质上是机会主义的文章还在蛊惑人心，本书的出版只是一个开始。今后我们将陆续提出有关华教运动和工作更多方面的论著，就教于社会上各方有识之士。

董教总任重道远

——明确使命、站稳岗位

目录

- 一 董教总应运而生 1
- 二 关于国家形态和民族教育问题 2
- 三 为什么要坚持“多元团结” 7
- 四 董教总大有作为 10
 - 第一个时期 10
 - 第二个时期 16
 - 第三个时期也即是当前时期 20
- 五 关于“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原则 26
- 六 回答几个问题 32
 - (一) 关于“董总变质”问题 32
 - (二) 所谓“路线斗争” 36
 - (三) 关于中文的经济价值问题 38
 - (四) 关于华教领袖 39
 - (五) 时下政权一旦轮替，华教困境就能完全解决了吗？ 41
 - (六) 民族团结与“跨族群”活动 42
- 七 小结 45

董教总任重道远

——明确使命、站稳岗位

◎ 明光

一 董教总应运而生

我国华文教育，在百多年来殖民统治当局的万般迫害和排斥下，独立后又在有关执政当局的重重阻扰和边缘化下，依靠华社各方面的鼎力支持，配合全国各层次开明进步力量的援助，在高压下挣扎成长，在困境中力争上游。到了今天，华教已经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高等院校的体系，成为我国教育百花园中一处花团锦簇的美景，这是得来不易的。

1950年代争取独立及建国以来，作为华族母语和民族教育的保姆，作为建设民族高等教育以捍卫公民权利和基本人权的机构，董教总应运而生。它

继承了先辈们的遗志，肩负起国家、民族赋予的弘扬文化、作育英才的历史使命，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站稳岗位、维护民族教育、发扬中华文化。

二 关于国家形态和民族教育问题

说到底，我国教育包括华文教育面对的问题，是受到国家、民族的命运和政治发展所规范的。争取民族平等权利和多元教育发展的斗争，也是广义的政治斗争和促进整体社会发展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年华教运动的先辈们在努力维护与发展华文教育的同时，也积极参与了争取国家独立和捍卫民主和正义的斗争，对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然而，国家独立后，之前遗留下来的教育问题其实并未能基本解决，尚且衍生了不少新的曲折，华文教育的生存与发展仍旧面对诸多难题。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这里先从宏观上对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略作探讨。

首先，在国外方面，让我们审视近代以来，基本上出现的三类国家形态和它们所面对的语言教育

问题吧:

1. 单一民族国家（西欧式）——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为了开拓各自统一的市场，近代在西欧多处领先出现了单一民族国家形态，它是在民族主义运动思潮指引下，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语言”的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

可是，在历史上不论是从继承前帝国的统治范围或者从全球化的移民现实来说，很少有国家符合此类型。更多标榜单一民族国家既无法解决国内各族群之间存在的差异，更在出现移民潮之后都成了准多民族国家。西欧各国从“欧洲经济共同体”进而建立“欧盟”，而后又加入某些东欧国家，可说正走向“各民族统一国家”的雏形。

其实，当代所鼓吹的单一民族国家的概念或目标，经常被用来在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里，规范、说服及迫使人民（各族群）对执政者所推行的体制的认同（主要是要求弱势族群接受同化政策）。

2. 强大民族主导的多民族国家（东欧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由旧帝国（如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沙俄帝国等）分解而来的东欧各国。这类型国家其内部是多民族的，但由某一强大的民族主导其他民族，即“多元一强”的国家体制。在语言、教育政策上，执政者强调的是强大民族的优越和优先，弱势族群则受到歧视。在政治运作中，强大民族在跨族群中是以当然代表自居，而弱势族群在维护本身权益时却被指为没有跨族群意义或妨碍国民团结而遭到肆意打压。

（处在上述西欧和东欧之间有个小国瑞士，它在区域政治角斗中宣布“永久中立”，在国内全部四个族群间，实行语言教育平等政策，但国小，又是特例，对外影响毕竟微弱。）

3. 新兴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几乎所有的欧美殖民地，各自都是在内部各民族取得共识从而合力建立主权国家的。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参加建国的各民族人民，都是有关

新兴国家的主人、当然公民，权利是平等的。但是，在语言教育政策上，这些国家执政者所实行的政策则各有差别。以我们周遭的国家而论，约略可分为三种模式：一是“印尼式”——追求西欧“单一民族”式；二是“印度式”——倾向东欧“多元一强”式；再一个是“新中国式”——它另辟蹊径，号称“多元平等”式。在这三种模式之中，由于长期冷战思维的作祟，极大部分新兴国家的执政当局是认同“印尼式”和“印度式”的，而对于“新中国式”，多存恐惧感，即使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善，但要正面看待“新中国式”，也还被视为政治敏感课题而少有问津。

再说，在国内方面，我国自独立建国以来，执政党最早为“联盟”，接着至今是“国阵”，其中占主导地位的一贯是巫统。巫统的主流所坚持的马来中心主义和单元语言教育政策，对我国民族之间的关系和各源流学校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邻国“印尼式”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语言”的政策也起着壮大声势的作用。国阵其他成员党虽然各不相同，有些也承认多元社会和尊重各民

族权利，但在巫统的威权下，特别是考虑到本身能获得分配到的各种利益，往往抱着屈服妥协的态度。

至于反对党方面，前有劳工党和人民党组成的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它曾表明在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国情下有需推行进步的语言教育政策的愿景，但后来又为此而闹分裂，以致在执政者的加紧镇压打击下，劳工党消亡，人民党式微。目前的民联三党，虽大有未来将会接管中央政权的势头，但如何在我国这么一个多元社会中，施行多元语言教育政策也还没有明确提出对策。近邻新加坡更陷入曲折倒退的境地，人民行动党于独立前曾一度高唱“平等对待四大教育源流”，但独立建国后为了迎合英美列强势力的需要，执政者于是全力扶持英文教育源流使之一支独霸；其他三支皆为母语教育源流（华文、马来文和谈米尔文）则被摧毁殆尽，连著名的民办最高学府南洋大学也被关闭。

无论从国外，特别是从国内的形势观察，对比之下，推行单元语言教育政策的压倒优势虽然已日渐减退，但时至今日还是保持较大的优势，还是执政者手中的王牌、心中的首选；多元语言教育共存共荣的政策，还处于相对弱势，未能真正抬头露

面。基于此，董教总在维护和发展华文教育和要求多元发展上所面对的阻力和障碍，那是可想而知的。明知山路险，也要从头越，董教总始终迎难而上，坚持“多元团结”的原则。

三 为什么要坚持“多元团结”

董教总为什么要坚持“多元团结”的原则，为什么在维护和发展华文教育和要求多元发展上，它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呢？因为它深信，这是在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这是为了体现我国国情的需要！

首先，有需指出，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度，是由马来族、华族、印族、伊班族、卡达山族以及众多人数较少的民族组成的民族大家庭。其中，人数较多分布广泛的主要有马来族、华族以及印族，这三个主要民族之间，各个都是不同的人们共同体，不仅是不同的种族共同体，而且还是不同的民族共同体。换句话说，他们是不同的种族（即人种），也是不同的民族，因为他们之间不仅仅存在着种族的差别，如皮肤的颜色、头发的形状和颜色、面部的轮廓、体格的构造等等不同的生理上的特征；而

且还存在着民族的差别，如语文、文化、风俗、宗教、民族心理等不同的民族特征。无可争辩的“多元”存在，这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其次，种族的差别和特征，是人类史上万年甚至数十万年演变形成的；民族的差别和特征，是千百年来文明发展史所形成的，无论是种族或民族的差异和特征，都是长久以来历史发展的产物，以后还会很长期地存在。基于此，西欧式或东欧式以至其他类似的模式，都不符合我国国情。试看，先不说历史悠久的种族，就以历史较短较后出现的民族而论，也是无法通过人工制造的，西欧式也好，东欧式也好，谁也无法创造一个新的单一民族或独强民族，而只能在政治上达致单一国籍的认同（不是单一民族，而是同一国民）罢了。在现代史上，法西斯主义者和极端种族主义者凭着本身主观的喜恶，企图抹杀和消灭非我族群(种族灭绝)，其结果是受到历史的惩罚，为人类带来灾害，以彻底失败告终。狂人希特勒有名言云：“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要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要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要从他们的学校下手。”而今地球依然转动，要被消灭的民族历危还安，希特勒也者，斯人安在哉？

再次，应该正确认识和肯定的是：我国的多元民族特色，不是弱点劣势，而是强点优势。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有我国这样的多民族相处共存，而且本地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欧美及西方文明共同发展的一块地方，可说是世界上少有的一块文明宝地！我们绝不能妄自菲薄，错将强点当为弱点；应该珍惜、保护、发扬这样的强点优势，在世界各国之中昂首挺立。要是我们坚持为此而努力，这不仅能为自己的国家，也能为世界作出贡献。

最后，在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由于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大或小的、先进或落后的民族，都是同样价值的，权利是平等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应歧视其他民族，而相反的，都应尊重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语言教育、风俗习惯等。在我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则大家受害，团结就大家得益。只有“平等”相待，才有“团结”可言，只有真正抱着“团结”的愿望，才能“平等”待人。当然，在奉行民族权利平等（包括语文、教育、宗教）的原则下，并不排除民族间现实存在的差异和发展不平衡，因此各民族间的互助和对弱势者的扶助，也是实现“平等团结”的必要条件，但这绝不是从另一方面来削弱甚至取消民族平等的原则。

基于上述，董教总为什么要坚持“多元团结”的原则，其理至明！

四 董教总大有作为

董教总在为本身所肩负的使命而奋斗时，面对的阻力和压力是巨大的、严峻的；然而，它可并非无所作为，应该说是大有作为。对此，不妨让史实出来说话。

以下，让我们首先审视1940年代末踏上1950年代直至整个1960年代，作为新马分家后当代华教运动第一个时期，华教所面对的道道难关。

第一个时期

在《1950年荷格报告书》受挫后，1951年英殖民政府公布《巴恩教育报告书》，企图建立以官方语文（英文、马来文）为媒介的所谓“国民学校”取代与消灭以华、印（淡米尔）语为媒介的所谓“方言学校”。正是在华文教育空前危机的时刻，1951年8月24至25日在吉隆坡召开的全国华校

教师公会代表会议上，通过成立马来亚华校教师总会（简称“教总”）。“教总”挺身而出，反抗殖民当局的奴化阴谋，捍卫民族教育，开展争取华文教育合理地位的运动。

接着，《1952年教育法令》出笼，殖民当局正式把枪口指向民族教育。1952年11月9日至10日，马来亚华校董、教代表及马华公会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议决组成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后来统称为“三大机构”），进而于1954年8月22日宣告马来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简称“董总”）正式成立。

尔后直至整个1960年代，殖民当局以及独立后的联盟当局接连推出各种针对和压制母语、民族教育的报告书和法令，如：

1954年10月发表的《1954年教育白皮书》，建议在一切非英文源流的学校设立英文班，以便逐步将这些学校转型为英文学校（由此衍生了“火炬运动”）。

1955年联盟胜选后，由其教育部长拉萨为主席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于1956年发表《拉萨报告

书》，建议“国家教育的最终目标必须是把各族儿童纳入一个以国语（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民教育体系”。

《1957年教育法令》基本上采取了《拉萨报告书》的建议，但没有接受其第12条文所说的“最终目标”。《1957年教育法令》第3条款明确规定“联合邦的教育政策是建立一个为全体联合邦人民所接受的国民教育体系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和促进他们的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发展，其目的在于使马来语成为国语，同时也维护及支持我国其他族群语文和文化的发展。”《1957年教育法令》将马来文小学称为“标准小学”，其他小学则称为“标准型小学”。中学方面，无论是以马来文或是英文、华文还是淡米尔文为主要教学媒介都称为“国民型中学”。在《1957年教育法令》，华文小学获得政府给予全部津贴；华文中学则获得政府给予部分津贴。

1960年《拉曼达立报告书》，它假借引述《1957年教育法令》所规定的国家教育政策，却将“同时也维护及支持我国其他族群语文和文化的发展。”这段极其重要的文字省略掉，同时把《1957年教育法令》没有接受的“最终目标”说成